

论编辑出版工作的职能

余运萍

编辑出版工作有多重职能,本文将其概括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文化职能三个方面。政治职能主要是指编辑出版工作对政治斗争的巨大作用,包含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等几个侧面;经济职能主要是指编辑出版工作对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包含以出版物获取经济利益,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这一次要侧面;文化职能是指编辑出版工作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包含文化积累职能、文化传播职能与文化导向职能等几个侧面。

编辑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认识编辑出版工作的职能,对于充分发挥编辑出版工作的作用,繁荣编辑出版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盲目性是导致失误和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对编辑出版工作职能的认识不正确或不全面,不但会直接影响编辑出版工作职能的充分发挥,陷入片面性或盲目性,而且会给两个文明建设造成损失。

编辑出版工作有多重职能,概而言之,可归纳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文化职能三个方面。

一、政治职能

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职能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首先造成舆论。舆论足以攻心,不但可以动员群众,而且可以组织群众。因此,即使是“流血的政治”——战争也不能没有舆论工作。就现代社会而言,编辑出版是做舆论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政治主张、目的可以通过出版物得到广泛的传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什么阶级、政党都十分重视编辑出版工作。列宁在给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中说:“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①列宁在为《火星报》所写的社论《从何着手》一文中说:“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可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出版启事上指出了编辑出版工作对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巨大作用:“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编辑出版杂志“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③图书对于政治斗争亦有重大作用,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就

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编辑出版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乃至阶级消灭之前,编辑出版工作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性。1957年7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部分新闻工作者时指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毛泽东同志曾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一篇编辑部文章中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⑧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编辑出版工作就不可能脱离政治或超越政治,在阶级社会里,超政治的绝对的“出版自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标榜“出版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闻出版亦有明确的政治要求,他们不但按照资本主义的政治原则进行严格的新闻出版检查,而且有时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取缔出版机构,查禁出版物。只有无产阶级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敢于公开承认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明确要求编辑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才享有真正的出版自由。

既然编辑出版工作有重要的政治职能,编辑出版工作者就应该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合格的政治素质,能自觉按照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严格把好出版物的政治关,充分发挥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职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加强阵地意识,防止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的侵蚀与干扰,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利益。这一点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十分重要。我国人民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中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成为过去,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并没有消灭,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还没有消除干净,国内外敌对势力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可避免,有时甚至还会激化。因此,编辑出版工作仍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对敌对势力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然而,政治职能只是编辑出版工作职能的一个方面,忽视这个重要方面固然会造成偏离正确方向的严重后果,但把政治职能夸大编辑出版工作的全部职能,甚至把一切出版物都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编辑出版工作肩负有多重职能,并非所有的出版物都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也不只是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编辑出版工作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重需要。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强化政治职能一端,不但会束缚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手脚,限制编辑出版工作多重职能的发挥,影响编辑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可能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造成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畸形发展,给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设置障碍。这一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沉痛深刻的教训。当前,编辑出版工作既要防止右,但更主要的是防止“左”。“左”的影响对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破坏是相当大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自觉地去肃清它的影响,就不可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现阶段,编辑出版工作的正确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指引的方向,就是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只有坚持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编辑出版工作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政治职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二、经济职能

编辑出版工作有重要的经济职能,这一职能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提高社会生产力;二是借出版物获取经济利益,直接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编辑出版工作肩负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职能。人类的生产实践经验、发明创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多种渠道和途径,出版则是其传播的主要渠道和途径。如果没有出版事业,科学技术的传播乃至科学技术自身的繁荣发展均会受到严重的限制。人类大约已在地球上生存了500万年,然而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只不过5000多年。考古发掘证实,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生产的发展速度比蒙昧时代要快得多。自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发明铅活字排版印刷术使出版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之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的速度远非现代出版业面世之前所能比拟。由此可见,编辑出版工作对于经济建设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对编辑出版的这一经济职能缺乏认识,即使有了编辑出版业,也不大可能自觉地去为经济建设服务。换言之,并不是只要有了编辑出版业就必然会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例如,活字印刷术和纸张均为我国古代发明,我国出版业的源头可以一直上溯到殷商时代,甲骨文和青铜文书可以说是最早的“出版物”。若以雕版印刷为出版业正式诞生的标志,大约早在隋唐之际,我国就有了正式的出版业^⑤。若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出版业正式诞生的标志,我国出版业的历史也要比欧洲出版业的历史早400多年。然而,由于我国古代出版业轻视科学技术,过分强调和突出经史文化的正统地位,直到1897年商务印书馆建立之前,我国出版业对经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极其有限,科学技术类的出版物极少。可以说,此前的我国出版业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经济职能还缺乏自觉意识。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这种状况才逐步有所改变,为经济建设服务逐渐成为编辑出版业的自觉意识,科学技术期刊和科技图书的出版得到重视。为了强化这方面的职能,现在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成立了科学技术出版社,其他类型的出版社也以各种方式自觉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出版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版物是商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编辑出版者可以借此换得经济利益,这也是编辑出版工作经济职能的一个侧面。出版业属于文化企业,可以而且应该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如果出版业长期亏损,单纯靠国家养起来,且不说国家养不养得起那么多出版企业,即使是完全有财力可以把出版企业全部养起来,恐怕出版业的发展也会非常有限,而且长此以往,出版业会脱离人民大众,失去自己在文化建设中应有的位置。

但是,必须明确指出,经济职能只是编辑出版工作诸多职能中的一项职能,而且借出版物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出版业直接为国家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又只是编辑出版经济职能中的一个次要侧面。编辑出版工作的经济职能应该主要通过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式去实现,而不是通过借出版物直接获取高额利润的方式去实现。如果过分夸大编辑出版工作的经济职能,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就会严重偏离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方向,造成极严重的后果。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出版物是商品,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具有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两重属性,精神产品属性是出版物的本质属性,或曰第一属性。如果抹煞这一本质属性,过分强调其商品属性,单纯以经济效益去衡量其高下优劣,编辑出版工作势必误入歧途。近几年,有些编辑出版工作者受拜金主义侵蚀,以追逐金钱为主要目标,迎合低级趣味和不良倾向,把一些宣扬社会主义阴暗面、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精神毒品和宣扬色情、暴力、恐怖的精神垃圾抛向社会,毒化社会风气,腐蚀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有的出版社甚至以“合作出版”、“自费出版”为名,出卖书号、刊号。在这些出版社和出版管理部门,选题申报、审批和书稿审读等管理制度实际上形同虚设。难怪许多作者、读者反映,过去出版一部书是“不朽之盛事”,颇为不易,颇受社会重视;现在只要有钱,不但文句不通的东西可以堂而皇之地冠以某某“学”之名由地位很高的出版社出版,而且令人作呕的精神垃圾常常印制得格外精美,生产速度之快,印刷数量之

多,发行范围之广,也简直令人吃惊。而有些价值很高的文化精品则因为不能赚大钱而受冷落。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卖不出去的东西(指不但不能赚钱反而还要使出版社亏本的学术著作)能有社会效益吗?这话表面上看来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则站不住脚。有些文化精品所创造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统一的,有些则不然。在衡量效益时不能仅着眼于眼前,还应有长远的观点。一般说来,越是学术性强的著作读者也就越少,读者面窄的书刊自然不可能有很大的发行量,在目前情况下,出版社、期刊社出版这样的著作和刊物不但不能赚钱,反而还要亏本。这些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刊物难道没有社会效益吗?有些读者面很窄的学术期刊和著作虽然不可能使出版社、期刊社获得高额利润,但却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如自然科学中某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即是如此,这类学术著作不但有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衡量学术著作的经济效益不能单纯看它是否能够使出版者获得高额利润,而主要应该看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例如,我国学术性期刊绝大多数是“亏损大户”,如果国家不予扶持,单纯靠“市场法则”来决定期刊的命运,那么,这些学术性期刊只好关门大吉,进入家庭的消闲性杂志和那些格调低下的小报、刊物反而可能“繁荣昌盛”。但无论从社会效益还是从经济效益来看,学术性期刊的地位应该说是得到全社会认可的。总之,如果编辑出版工作者单纯用能否赚钱来决定对出版物的取舍,大批文化精品便会被扼杀,精神毒品和精神垃圾便会泛滥成灾,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形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三、文化职能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对它的界定是文化学者面临的一大难题。什么是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尽管学者们已经给了它几百个“定义”。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是一回事,都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我国学者庞朴先生似持有此见,他将文化剖为物质的、心理的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制度的三个层面^⑥。梁漱溟先生则更明确地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无所不包”^⑦。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从精神层面和心理层次来界定文化,认为文化只是文明的一个部分,主要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属于心理层次。或者说,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才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只有当物质产品包含着人类丰富的心理内容,是人的精神活动的物化形式的时候,它才能被视为文化产品。我以为后一种看法似乎更加准确地把握了文化的本质,因此,我主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编辑出版工作的文化职能。

所谓文化职能,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功能,诸如繁荣学术,积累储存知识,传播人类的思想文化、创造精神环境等等作用。文化职能虽然与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同于这两项功能。如果细加分辨,编辑出版工作的文化职能大约可以区分为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导向等几个层面。

文化积累实际上指的是编辑出版工作对文化成果的存储作用。编辑出版工作可以突破人脑记忆的局限,使人类重要的精神创造得以永久储存。人类的文化创造不可能离开文化积累,任何文化巨匠都不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而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在前人丰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的。如果没有前人的文化积累,人类的文化创造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例如,没有电的发明,就不可能有电子计算机;没有蒸汽机和滚动的车轮的发明,就不会有汽车、火车。一些现代原始部落之所以能够从石器时代很快进入钢铁时代,正是因为人类先进民族的文化积累给他们提供了文化飞跃的基础。人是有记忆能力的高等动物,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可以凭借

记忆而得以存储,某些重要的生产生活经验还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而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长久的传承。书籍发明之前,口耳相传是人类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但是,人的记忆是非常有限的。《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正说明了人类为了突破记忆的局限才创造了文字和书籍。书籍不但可以克服人脑记忆的局限,而且可以突破口耳相传的范围及局限——口耳相传不仅会受到时空的严重制约,而且难于表达复杂的事物,以讹传讹不可避免。随着时光的流逝,口耳相传的文化成果易于湮灭。文字和书籍面世以前的时代之所以被称作“黑暗时代”或“蒙昧时代”,正在于此前的文化创造和历史进程没有清晰准确的记录。自从有了文字,人类很快就创造了各式各样的书籍——石头的、甲骨的、竹木的、青铜的、布帛的、纸张的……。编辑出版与书籍的出现几乎同时,最早创造书籍的人也就是最早的编辑家和出版家——只不过当时的作者、编辑者和出版者是集于一身的。自从有了书籍的出版,人类的文化创造也就有了准确、详尽的记录,那些无法以口耳相传的文化成果得以存储。从此,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化——书籍的编辑出版标志着人类告别“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可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创造的文化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编辑出版的成果——书籍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人类文明史与编辑出版史是紧相伴随的,编辑出版在文化积累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功能。譬如,华夏文化积累主要是靠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碑石篆刻、竹帛简册、写本刊本等书籍的编辑出版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些珍贵典籍的编辑出版,华夏文化就不可能有如此悠久深厚的传统和宏富博大的气象。

编辑出版工作有巨大的传播功能。所谓文化传播指的是不同文化的互相接触。人类的文化创造不但要受到时间——历史时代的限制,而且还会受到空间——地理位置的限制。不同时空的文化如果不能发生接触,人类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现代原始部落之所以落后得惊人,正在于长期与世隔绝,缺乏与先进民族的沟通和交流。人类的智慧只有在人与人的碰撞、借鉴中才能更快地增长。文化传播有多种方式与途径,民族间的迁徙与交往是大众传播媒介尚不发达之时代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人民大众是文化的搬运工。例如,我国古代的丝绸之所以传播到欧洲,异域的宗教、乐舞之所以传入我中原大地,均在于人民群众的“搬运”。但是,民族间的迁徙与交往往往要受到时空的限制,特别是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不同民族的迁徙与交往十分困难、非常有限。而编辑出版物作为一种极便捷的传播媒介,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把远古时代的文化创造准确地记录下来传之久远,可以使远隔重洋的异域文化得以交流融汇。如果没有佛经作为媒介,佛教传入我国的速度、范围就会大受影响,如果没有《圣经》的出版,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也会大大受阻。广播、电视节目的编辑播出更使全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文化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今非昔比。文化传播功能的充分发挥使不同文化的碰撞、借鉴得以顺利及时地进行,全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共享便成为现实。

编辑出版工作还有重要的文化导向功能。所谓文化导向功能是指编辑出版工作对文化发展指向的牵引。编辑出版工作并不只是被动地记录和机械地“搬运”人类的文化创造成果,而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成果主动地进行选择,编辑出版工作是人的文化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编辑出版对文化成果的选择又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指向。例如,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他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编辑家和出版家,他对古代文化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我国文化的发展指向。《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正因为孔子编纂整理了我国古代不少典

籍,所以汉代的王充在其《论衡》中称孔子为“篇家”。孔子编纂古代文化典籍并非机械地“搬运”和被动地抄录,而是既有“去”,亦有“取”,去取之标准是看它能否“施于礼义”。礼义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一发展指向早在孔子之时即通过他编次古籍得以初步确立,后来又由“钦定”、“御纂”经史子集的方式多次予以强化,使我国古代文化一直沿着循礼守制,隆礼贵义的指向发展。晚清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轰毁了我国封建社会封闭腐朽的国门,西学逐渐传入我国,我国编辑出版业对西方文化进行了选择,科学与民主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文化发展的指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十几年来的编辑出版工作对我国当代文化发展指向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文化热的兴起与改革潮的奔涌均与出版业的文化“导向”密切相关。

编辑出版工作既可以净化文化环境,扶正文化发展的走向,也可以毒化社会风气,驱使文化滑入歧途。近几年来,宣扬封建迷信、色情淫秽的出版物屡禁不止,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对这种状况若听之任之,势必会导致文化变质。因此,党和政府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斗争,加强对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用法律武器净化文化市场,规范出版行为,这是完全正确、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编辑出版工作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如果用一种职能去取代其它职能,不仅会使出版业的路子越走越窄,而且有可能导致文化的畸形发展。要全面、充分地发挥编辑出版工作的多重职能,必须首先对其多重职能有正确认识。

注 释:

-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85~86页。
- ②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7、8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3页。
- ④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 ⑤ 关于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何时,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在东汉,有的认为在宋代。这里采用了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说法。
- ⑥ 《光明日报》1986年1月17日。
- ⑦ 《中国文化要义》台湾正中书局版,第1页。

(责任编辑 江 平)